

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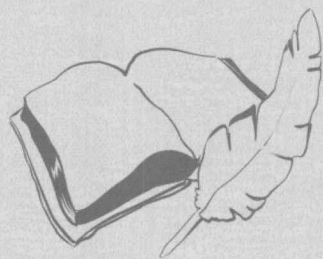
国际敦煌学丛书

王冀青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M. Aurel Stein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

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旅行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

王冀青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王冀青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4.11

ISBN 7-5423-1007-0

I. 斯... II. 王... III. 考古—中国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849 号

责任编辑:薛英昭 康克仁

封面设计:徐晋林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

王冀青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4.25 字数 600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00

ISBN 7-5423-1007-0 定价:6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国际敦煌学丛书

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

本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研究”的成果之一，该项目批准号为：02JAZJD750.11-44005。

本课题的资料搜集和前期研究工作还获得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和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项目（The 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资助。

“国际敦煌学丛书”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前言

所谓“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习惯上应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指英国印度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1862—1943年）于1930年至1931年在中国新疆省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过程中所记录的旅行日记。我在给甘肃教育出版社交书稿时，原稿的书名还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考释》。但在校对过程中，出于种种考虑，经过与出版社多次协商，最后时刻确定了《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这个书名。“中亚考察”这一词组，原本是学术界对近代各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多学科考察活动的惯用统称。斯坦因的历次中亚考察，包括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但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前苏联中亚地区5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原来那个国

家界线模糊的“中亚”地理概念在涵义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国际政治学里特指某几个国家的区域名称。近代历史上常常以中国新疆为中心区域的“中亚”概念已今非昔比，很难再轻易地与中国西北地区画等号了。所以我在书名中用“中国”一词代替了“中亚”一词，这样可以更明确地表示，斯坦因中亚考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国境内。而“考察”一词原来也常用“探险”一词取代，其涵义本来就很笼统，很难归入到具体的学科范围里去，放在书名里也显得不很响亮。于是我思来想去，决定在书名中用“考古”一词代替“考察”一词，表明斯坦因中亚考察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古学方面。但需要声明的一点是，考古学虽然是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的主要领域，但斯坦因中亚考察的内容还包括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从这个角度讲，将本书的书名调整为《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也不见得十分贴切。因此，我也只是在正书名中使用了“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的字样，而在副标题“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旅行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中，以及在全书的正文中，还都沿用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之类的习惯称谓。

众所周知，斯坦因是近代中亚考察史或者说中国西北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一生中在中国西北新疆省、甘肃省等地区进行过四次以考古学为主要目的的所谓“中亚考察”。斯坦因的前三次中亚考察，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成功”的考察，因而受到普遍重视。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于1900年至1901年间在中国新疆省进行，他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书主要有3种：初步报告书《在中国突厥斯坦进行考古学和地形测量学考察旅行的初步报告书》（*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一卷本，1901年由英国伦敦爱勒和斯鲍提斯伍德（Eyre & Spottiswoode）出版社出版；考察游记《沙漠埋藏的和闐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进行一次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旅行的个人自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一卷本，1903年由英国伦敦费舍尔·乌文（T.

Fisher Unwin) 出版社出版; 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在中国突厥斯坦进行考古学考察的详尽报告书》(*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两卷本, 1907 年由英国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 (Clarendon Press) 出版。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于 1906 年至 1908 年间在中国新疆省、甘肃省进行, 他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书主要有两种: 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在中亚和中国极西部地区进行考察的个人自述》(*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两卷本, 1912 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公司 (Macmillan & Co. Ltd.) 出版; 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极西部地区考察的详尽报告书》(*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五卷本, 1921 年由英国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于 1913 年至 1916 年间在中国新疆省、甘肃省等地进行, 他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书主要有 1 种: 详尽报告书《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书》(*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四卷本, 1928 年由英国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此外, 斯坦因还发表、出版过许多与前三次中亚考察有关的论文、讲演稿、地图集、画册等。斯坦因在其前三次中亚考察过程中, 调查发掘了中国新疆省、甘肃省境内众多的古代遗址, 将包括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西北文物劫往英国或英属印度, 从而奠定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资料基础。斯坦因关于这三次中亚考察的上引各种报告书和论著, 也一直是国际敦煌学界的经典著作。最近 10 年来, 中国国内几家出版社已经或正在出版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各种报告书的中译本, 这将为国内学术界了解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的细节提供很大的方便。

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于 1930 年至 1931 年间在中国新疆省进行, 由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大英博物院联合资助。这次考察开始于 1930 年 8 月 11 日, 斯坦因在这一天离开英属印度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 踏上通往中国新疆省的吉尔吉特道。由于中国的政治局势自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全国各界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的爱国觉悟也日益提高，所以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坚决反对，受到中国各级政府（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和新疆省政府）的多方阻拦。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坦因还是怀揣着空前庞大的文物掠夺计划，无视中国人民的抵制情绪，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重重阻力，千方百计地闯入中国境内，在新疆省进行了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等方面的考察旅行，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斯坦因在1930年11月11日至1931年4月25日间最后一次绕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后，看到实在无法按照原订方案实施他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考察计划，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新疆，又经吉尔吉特道，于1931年7月2日返回斯利那加，结束了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统计下来，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一共进行了326天。

斯坦因在结束第四次中亚考察之后，出于种种考虑，没有撰写出版过任何有关这次考察的初步报告书、考察游记或详尽报告书。除了在英国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一两篇谩骂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文外，斯坦因生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第四次中亚考察的文章。在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结束后，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公司曾于1933年出版过一部关于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的概述性著作，书名为《在古代中亚的道路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但其中也没有涉及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由于当事人的沉默，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匮乏，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详情细节了解甚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专门著作问世。西方学者偶尔在斯坦因传记中提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但碍于所涉问题之敏感，往往只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地勾勒出个粗线条来，语焉不详，观点片面，错误百出。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西北考古史研究领域都具有研究价值的重大事件，对于这样一个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未解之谜，中外学术界的许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加以关注。

我本人就属于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素怀浓厚兴趣的这一类人。为了说明本书的来历，我想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研究斯坦因

第四次中亚考察的过程。我于1978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后，由于此前一直学习美术的缘故，很快就对所谓的“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79年开始，在大学毕业之前，我断断续续地翻译了斯坦因著《契丹沙漠废墟》、《古代和阗》等书以及相关的几本英文书。当然，我在上大学期间搞的这一系列翻译活动，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练习专业英语，其次是为了学习敦煌佛教美术及相关知识，第三是为了给其他老师提供研究参考资料，而从来没有要正式出版的打算。我在上大学期间首次接触斯坦因著作的这种经历，导致此后我对斯坦因其人其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导致我从此关注收藏在英国的斯坦因搜集品，导致我开始系统搜集斯坦因著作和斯坦因传记。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继续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敦煌学方向研究生，其间虽然重点研究英国藏斯坦因搜集品中的汉文文书，但对斯坦因中亚考察的兴趣依然不减。上研究生期间，我阅读并翻译了美国学者珍妮特·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撰写的《考古学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一书，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于1977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第一部斯坦因传记。我在阅读该书过程中，对该书第26章中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简单描述极感兴趣。从米尔斯基那些闪烁其词、模糊隐晦的句子中，我感觉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是一个比较敏感，且存在不少空白、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任教。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当作我此后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当然知道，要想深入细致地探究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第一步要做的是资料搜集工作。于是我从简易入手，首先查阅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内发行的报刊，将上面遗留下来的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有关的蛛丝马迹大致搞清。同时我也感觉到，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有关的主要原始档案资料肯定都是英文文献，而且肯定大部分收藏在英国。而要想查阅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原始英文档案资料，要想真正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真相搞得水落石出，那就必须到英国去。

1989年初，应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Oriental Collections, The British Library）的邀请，在美国纽约北美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资助下，我第一次赴英国伦敦从事研究工作。我这次去伦敦工作的最初理由，是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等机构联合整理刊布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到伦敦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有关负责人建议我在项目工作之余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其它个人课题，于是我就将调查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英文档案作为我的个人课题。这次在伦敦工作期间，我在个人课题方面的最大收获，当属在大英博物院档案部（The British Museum Archives）的地下室里首次发现一批有关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官方档案资料。在1989年春、夏两季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每周都花一些时间，蜷伏在大英博物院档案部的地下斗室里，在工作人员严密的监督之下，用铅笔逐字逐句抄录了两盒原始档案资料。在项目工作和档案抄录工作之余，我利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对所抄录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档案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每日晚上，当我返回宿舍后，又将已抄录的英文档案资料陆续翻译成中文。我本来还打算，要应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好意邀请，在英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以全面调查研究斯坦因中亚考察档案，但当年国内的政治风波扰乱了我的研究计划，促使我在1989年年底回国。

从1990年起，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藏中国新疆历史文物的整理与研究”。这个项目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斯坦因搜集品，当然也要涉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及考察所获文物。1991年春季，我还应加拿大政府的邀请与资助，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机构做访问学者，在加拿大各地图书馆中，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研究课题搜集到一些当时在国内难以见到的中国近代史背景资料。1991年6月至1992年7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招聘与资助，我赴日本东京从事研究工作，任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东洋文库收藏着

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有关亚洲历史文化的全部图书、刊物以及大量未刊资料复制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我在东洋文库工作期间，利用丰富的馆藏图书，重点研究近代中亚考察史和中国西北考古史，从而完成了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这个研究课题搭建整体框架的工作。我即将结束在日本的研究工作时，东洋文库请我做一次学术报告，就日本学术界尚不了解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发表研究结果。1992年6月23日，东洋文库专门为我举行了特别讲演会，我以“斯坦因氏第四次中央亚细亚探险（1930—1931年）之研究”为题目，做了一次讲演。在特别讲演会的当日，会场上散发了我的讲演稿全文（『スタイン氏第四回中央アジア探検（1930—1931年）の研究』，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特别讲演会讲演稿，东洋文库，1992年6月23日），这是我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初步研究结果的首次发表物。稍后，我将这篇讲演稿简化成《奥莱尔·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探险》一文，先提交给1992年9月在兰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做学术交流，后发表在《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上。从此以后，我在国内外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文章，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罗列篇目了。

1993年，我的研究课题“近现代欧洲、北美、日本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科学考察史”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的资助，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其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为了集中精力整理研究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档案，也为了进一步研究整个斯坦因中亚考察档案，我在1993年还申请到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欧、北美、日本散藏的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来华考察档案的辑录与研究”，从而使我调查、整理、研究斯坦因中亚考察档案的工作正式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而国家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1994年秋季，我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查阅资料，对馆藏有关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中文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与抄录。与此同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将馆藏有关斯坦因第

四次中亚考察的零星中文档案刊布于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的文化分册。与英国官方保存下来的英文原始档案或斯坦因本人遗留下来的英文记录相比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中文档案显得残缺不全,保存不善,但是仍有许多足以填补空白的价值,是我研究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辅助资料。

1995 年初春,我应英国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的邀请,由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The 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资助,以“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A Study of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为研究课题,第二次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我这次赴英,全力搜集了英国各机构散藏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档案,主要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整理研究保存在这里的斯坦因手稿,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整理研究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与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收藏的斯坦因档案。我这次赴英研究的课题虽然是“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但我并没有将资料搜集工作局限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方面,而是乘机对整个英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与研究。我在这次赴英研究期间,一共过目了大约 10 万页与斯坦因有关的原始档案,通过抄录、复制、摄影等手段,将其中最重要的大约 3 万页与斯坦因中亚考察有关的档案资料掌握在手。我在当年秋天离开英国时,千方百计将这批资料带回中国,其中包括这部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

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手写原稿,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编入斯坦因手稿第 224 号和第 225 号。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第 224 号实际上是一本完整的日记簿,总页数是 iv + 456 页。这本日记簿的主体部分,即斯坦因手稿第 224 号第 127—444 页,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原稿的第一部分,包括 1930 年 8 月 11 日至 1931 年 4 月 16 日斯坦因在英属印度克什米尔、中国新疆省喀什噶尔、和阗、于阗、尼雅、且末、若

羌、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等地进行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但这本日记簿并不是全部用来记录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斯坦因在记录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之前，这本日记簿已经使用了两年多时间。因此在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之前，还冠有斯坦因的其他旅行与考察日记，其中日记簿第1—97页是1928年3月20日至4月13日斯坦因在印度俾路支斯坦进行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第98页空白，第99—123页是1930年4月14日至5月13日斯坦因在日本奈良等地和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访问时的旅行与访古日记，第124—126页空白。在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第一部分之后，也就是在斯坦因手稿第224号第445—452页上，记录的是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间斯坦因制作的旅行道里统计表，因为没有顺序，又不连贯，而且内容繁杂，所以我在整理、翻译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过程中就省略不译了。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第225号也是一本日记簿，总页数是iv+472页。这本日记簿的开头部分，即斯坦因手稿第225号第1—83页，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原稿的第二部分，包括1931年4月17日至7月2日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省巴楚、喀什噶尔等地和英属印度克什米尔等地进行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但这本日记簿也不是全部用来记录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后面还附有其他旅行与考察日记。这本日记簿的主体部分，即斯坦因手稿第225号第84—472页，是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间斯坦因在印度旁遮普、波斯（伊朗）俾路支斯坦进行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

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开始于1930年8月11日，结束于1931年7月2日，实际上记录了326天的活动。所谓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原稿，指的便是斯坦因手稿第224号的第127—444页（1930年8月11日至1931年4月16日日记），以及斯坦因手稿第225号的第1—83页（1931年4月17日至7月2日日记）。总的说来，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经历的这326天的日记是逐日记录下来的。但是斯坦因在新疆省于阗县卧床养病期间，大概因病懒于写作的缘故，

有3次连日合记日记的情况，即1930年12月19日至1930年12月26日合记一篇，1930年12月27日至1930年12月30日合记一篇，1931年1月1日至1931年1月2日合记一篇，而其余日记都是一日一记。因此，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326天中记录了315篇日记，少了11篇日记。

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是我们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了解这次考察进程的惟一依据，因此这部日记在中亚考察史和中国西北考古史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有鉴于此，我决定在正式出版有关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多卷本研究论著之前，首先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整体刊布出来。西方学者或作家的未刊手稿以中译本的形式首次刊布于世，这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过先例，因此我的工作肯定是一次艰难的尝试。要想在没有任何现成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根据字迹潦草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英文手稿，刊布出一个中译本来，这绝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我为这项工作的进程确定了三个主要环节，即整理、翻译和考释。

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在形式上让斯坦因手稿第224号第127—444页和斯坦因手稿第225号第1—83页上的文字构成一个整体，使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内容连贯起来，以便于读者阅读。斯坦因记录日记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别人阅读，而只是为他自己提供备忘录，为他自己有朝一日撰写考察游记或其他报告书时有据可依。对于这样的记录，必须经过整理之后，才适合摆放在读者眼前。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我将整个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分成了20个部分，每个部分加了一个小标题。第一部分“从斯利那加到吉尔吉特”包括12天的日记（1930年8月11日至1930年8月22日）；第二部分“在吉尔吉特和罕萨等待进入中国”包括20天的日记（1930年8月23日至1930年9月11日）；第三部分“从罕萨到丕伊克卡”包括12天的日记（1930年9月12日至1930年9月23日）；第四部分“从丕伊克卡到喀什噶尔”包括13天的日记（1930年9月24日至1930年10月6日）；第五部分“在喀什噶尔等待考察”包括35天的日记（1930年10月7日至1930年11月10日）；第六部分“从喀什

噶尔到和阗”包括 19 天的日记（1930 年 11 月 11 日至 1930 年 11 月 29 日）；第七部分“在和阗逗留”包括 7 天的日记（1930 年 11 月 30 日至 1930 年 12 月 6 日）；第八部分“从和阗到于阗”包括 12 天的日记（1930 年 12 月 7 日至 1930 年 12 月 18 日）；第九部分“从于阗到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札”包括 28 天的日记（1931 年 12 月 19 日至 1931 年 1 月 15 日），由于这段时间里有 3 次数日合记的缘故，28 天记录了 17 篇日记，少了 11 篇日记；第十部分“在尼雅遗址考察”包括 10 天的日记（1931 年 1 月 16 日至 1931 年 1 月 25 日）；第十一部分“从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札到且末”包括 17 天的日记（1931 年 1 月 26 日至 1931 年 2 月 11 日）；第十二部分“在且末逗留·从且末到若羌”包括 13 天的日记（1931 年 2 月 12 日至 1931 年 2 月 24 日）；第十三部分“从若羌到库尔勒”包括 20 天的日记（1931 年 2 月 25 日至 1931 年 3 月 16 日）；第十四部分“从库尔勒到库车”包括 13 天的日记（1931 年 3 月 17 日至 1931 年 3 月 29 日）；第十五部分“从库车到阿克苏”包括 11 天的日记（1931 年 3 月 30 日至 1931 年 4 月 9 日）；第十六部分“从阿克苏到喀什噶尔”包括 16 天的日记（1931 年 4 月 10 日至 1931 年 4 月 25 日）；第十七部分“在喀什噶尔等待回国”包括 22 天的日记（1931 年 4 月 26 日至 1931 年 5 月 17 日）；第十八部分“从喀什噶尔到丕伊克卡”包括 15 天的日记（1931 年 5 月 18 日至 1931 年 6 月 1 日）；第十九部分“从丕伊克卡到吉尔吉特”包括 15 天的日记（1931 年 6 月 2 日至 1931 年 6 月 16 日）；第二十部分“从吉尔吉特到斯利那加”包括 16 天的日记（1931 年 6 月 17 日至 1931 年 7 月 2 日）。当然，我在划分这 20 个部分时，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可以遵循，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有点随心所欲，以至于各个部分所包括的天数、日记字数等有点失衡的感觉。好在划分部分的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便于阅读和标明内容，有点类似一般书中的章节设置，所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了，我并没有太用心于此。

其次还需要理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中的时间顺序，用一个标准的形式去加以表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原稿上，只有 1930 年 8 月 11 日写的第一篇日记中，年、月、日、星期数等日期记

录是完整的，而其余日记标明的日期都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除1930年8月11日日记外，1930年内记录的其余日记中全部省略掉了日期的年份（1930年）。除了1931年1月1日至1931年1月2日日记（合记）、1931年1月4日日记外，1931年内记录的日记中也全部省略掉了日期的年份（1931年）。此外，在1930年8月17日日记、1930年8月18日日记、1930年8月19日日记、1930年8月20日日记、1930年8月21日日记、1930年9月15日日记、1930年12月17日日记、1930年12月18日日记、1930年12月19日至1930年12月26日日记（合写）、1930年12月27日至1930年12月30日日记（合写）、1930年12月31日日记、1931年1月1日至1931年1月2日日记（合写）、1931年1月3日日记、1931年1月4日日记、1931年1月5日日记、1931年1月6日日记、1931年1月7日日记、1931年1月8日日记、1931年1月17日日记、1931年1月18日日记、1931年1月19日日记、1931年1月20日日记、1931年3月2日日记里，所记录的日期中没有标明星期数。对于上述这些年份和星期数的缺失，我在整理日记时全部补加了上去。

更需要注意的是，从1931年1月31日日记开始，斯坦因日记中日期的星期数出现了不吻合的问题。斯坦因在1931年1月30日日记中，正确地标明“1月30日（星期五）”，而在1931年1月31日日记中，却搞错了星期数，将本是星期六的这一天错误地标明“1月31日（星期五）”。从此，斯坦因日记中的星期数和准确的日期相差一天，譬如1931年2月1日是星期日，却被斯坦因错误地标明“2月1日（星期六）”。这种错误一直要持续到1931年3月15日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除了1931年3月2日未标星期数之外，其余星期数都是标写错误的。到了1931年3月15日，斯坦因在写日记时先错误地标明“3月15日（星期六）”，后来发现了错误，由他本人改正为“3月15日（星期日）”。从此以后，斯坦因日记中的星期数才和实际日期吻合起来。当斯坦因于1931年3月15日发现星期数有错误时，又回过头去寻找开始出错的时间，追溯到1931年1月31日日记，将“1月31日（星期五）”改正为“1月31日（星期六）”。但是，对于1931

年1月31日和1931年3月15日之间所记日记上标写错误的星期数，斯坦因并没有加以改正。对于所有这些星期数的标写错误，我在整理日记时全部改正了过来。

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翻译也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斯坦因日记的原稿是手写体，而不是印刷体。斯坦因手书的文字基本上还算工整，但毕竟不像斯坦因出版物那样排得整整齐齐、清晰易读，当然也就不能像翻译斯坦因出版物那样轻松地翻译成中文。斯坦因一般是用钢笔写日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墨水写成的文字随处可见墨迹漫漶或褪色的情况，许多字句需要经过仔细辨识之后才能推测出其原意来，而且这种推测有时就是猜测，不免会出现错误。斯坦因进行野外考察的时间多在冬季，遇到天寒地冻时分，由于钢笔里墨水结冰，迫使他不得不改用铅笔写日记，而冻僵的手用铅笔写出来的字更显得潦草，难以辨认。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虽然用英语写成，但这种英语是斯坦因独有的一种日记体，语法不规范，句子成分尽量简化，有时一个词就是一句话，因为他写日记只是为了他本人能够看懂或理解。面对这样的文体，翻译时需要格外仔细地斟酌其含义，一不小心就会理解错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中，还有一些代用符号、缩略词、首字母等，用来代替人名、地名或地貌名等。我通过大量的档案排比工作和资料查阅工作，已经将其中大部分考证清楚，但有些考证结果是否准确，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斯坦因是一位既精通欧洲各国主要语言又通晓多种亚洲语言的学者，所以在他的英文日记里习惯夹杂以其他各种语言的词汇、句子，甚至段落。尤其是斯坦因在记录第四次中亚考察所经地区的山脉、河流、峡谷、地貌、植物、动物、农作物等对象时，往往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加以记录。1922年至1924年间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的克拉蒙特·波西瓦尔·斯克兰（Clarmont Percival Skrine）在1926年出版的游记《中国的中亚——在克什米尔北部和中国突厥斯坦的旅行记录》（*Chinese Central Asia: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Northern Kashmir and Chinese Turkestan*）中，曾这样描述后来斯坦因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时所经地区的语言状况：“谈到语言这个话题时，我们也许有兴趣提一提，在